

“奴”作自称称谓词小考*

——兼谈《撰集百缘经》的译成时地

真大成

(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)

提 要 “奴”至晚从中古后期开始可以作自称称谓词,这种自称用法可能源于当时鲜卑、突厥等操阿尔泰语系语言的游牧民族。鲜卑、突厥等以本族语(或阿尔泰语系诸语言)中专表奴隶、奴仆义的词作为臣下对君主的自称,汉语则以“奴”来对译,以致作自称的“奴”最初流行于北朝,继而扩散开来,至唐代中晚期成为全民用语,不限性别与身份。自称称谓词“奴”的用法及行用时地,可以作为推定旧题三国吴支谦译《撰集百缘经》译成时地的语言证据之一。

关键词 奴 自称 来源 撰集百缘经

汉魏六朝以来,“奴”作社会称谓词(对称和他称),绝大多数时候含有鄙贱轻视之义,有时又含亲昵意味,这是很常见的现象,不必赘说。蒋礼鸿(1997:1)依据敦煌变文及《太平广记》指出“奴(孃)”“阿奴”在唐代还可作为“第一人称代词,和‘我’相同,男女尊卑都可通用”^①。由此看来,称谓词“奴”从中古到唐代发展出自称的新用法。那么,这种变化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,是什么原因促成这种变化^②? 本文主要对这两个问题铺排一些材料,提出一点假设,并略谈与之相关的《撰集百缘经》

*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汉语词汇通史”(14ZD093)的阶段性成果。初稿承蒙汪维辉教授、方一新教授、朱冠明教授、李明研究员、胡波副教授及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博士生戴佳文、硕士生何苏丹、潘洁妮惠赐高见,本文曾在“汉语言文字学高端论坛暨《清华语言学》创刊学术研讨会”上宣读,得到邢向东、杨永龙教授的指教,谨统致谢忱。

① 除蒋礼鸿(1997)外,还可参看吕叔湘(1985:13-14)。

② 钱大昕《十驾斋养新录》认为自称的“‘奴’即‘侬’之声转”,蒋礼鸿(1997:2)赞同其说,谓“‘奴’、‘侬’是一音之变”,恐不可信。

的译成时地。

1. “奴”作自称的时代

“奴”本指奴隶、奴仆,与“臣”“仆”“妾”“婢”等为一类词;后者在上古汉语中均可作自称称谓词,“奴”作自称则要晚得多。调查中古文献,可见以下四例:

(1) 忽有河内太守田怙家奴告省门亭长云:“今且为令王借车牛一乘,终日于洛滨游观。至晚,王还省,将军出东掖门,始觉车上无褥,请为记识。”时世隆封王,故呼为令王。亭长以令、仆不上,西门不开,无车入省,兼无车迹。此奴固陈不已,公文列诉。尚书都令史谢远疑谓妄有假借,白世隆付曹推检。时都官郎穆子容穷究之,奴言:“初来时至司空府西,欲向省,令王嫌迟,遣二防阁捉仪刀催车。车入,到省西门,王嫌牛小,系于阙下槐树,更将一青牛驾车。令王着白纱高顶帽,短黑色,候从皆裙襦袴褶,握板,不似常时章服。遂遣一吏将奴送入省中厅事东阁内东厢第一屋中。”其屋先常闭锁。子容以“西门不开,忽言从入;此屋常闭,奴言在中”诘其虚罔。奴云:“此屋若闭,求得开看,屋中有一板床,床上无席,大有尘土,兼有一瓮米。奴拂床而坐,兼画地戏弄,瓮中之米亦握看之。定其闭者,应无事验。”(《魏书·尔朱彦伯传附尔朱世隆》)

(2) 手下苍头常令秉烛,或时睡顿,大加其杖,如此非一。奴后不胜楚痛,乃白琛曰:“郎君辞父母,仕宦京师。若为读书执烛,奴不敢辞罪,乃以围棋,日夜不息,岂是向京之意?而赐加杖罚,不亦非理!”(《魏书·甄琛传》)

(3) 譬如有人将欲远行,敕其奴言:“尔好守门,并看驴、索。”其主行后,时邻里家有作乐者,此奴欲听,不能自安,寻以索系门置于驴上,负至戏处,听其作乐。奴去之后,舍中财物贼尽持去。大家行还,问其奴言:“财宝所在?”奴便答言:“大家先付门驴及索,自是以外,非奴所知。”(萧齐·求那毗地译《百喻经》卷3《奴守门喻》)

(4) 车匿报言:“国大夫人!奴身不敢弃舍太子。夫人!太子自弃舍奴。太子付我乾陟马王及诸瓔珞,教来回还,速疾向家,畏大夫人心中忧愁,令得安隐无恼患故。”(隋·阇那崛多译《佛本行集经》卷19《车匿等还品中》)

以上四例中的“奴”显然指称说话人自身,不过由于例(1)至(3)说话人为“家奴”“苍头”“奴”,指称自己的“奴”还具有强烈的自示身份的作用。例(4)车匿是悉达多太子的车夫,乃其仆役,他称自己为“奴”,还是表明身份。

下例则有不同:

(5) 延伯不与其战,身自殿后,抽众东渡,转运如神,须臾济尽,徐乃自渡。贼徒夺气,相率还营。宝夤大悦,谓官属曰:“崔公,古之关、张也。今年何患不制贼!”延伯驰见宝夤曰:“此贼非老奴敌,公但坐看。”(《魏书·崔延伯传》)

崔延伯自称“老奴”。崔虽为萧宝夤的下属,但不具有人身依属关系,“老奴”已经不再指示身份,可以看作比较成熟的自称称谓词。

据此,“奴”作下对上(卑对尊)的自称,至少在中古后期应已出现,而非晚至唐代;但文献用例较少,可见尚未行用。

2. “奴”产生自称用法的促发因素

称谓词“奴(阿奴、老奴)”本是中古习用的口语,用以对称或他称,那么何以在中古后期发展出自称用法?^①作为与“奴”同一义类的“臣”“仆”“妾”“婢”等很早就用为自称称谓词,那么为什么“奴”偏偏先有对称或他称的用法,然后才作自称?

“奴”在中古后期产生自称用法,不仅与自身语义有关^②,可能还有外在的促发因素。

从史料可见,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对国君自称“奴”,相当于汉人称“臣”。

(6)(拓跋)焘还至湖陆,爽等请曰:“奴与南有仇,每兵来,常虑祸及坟墓,乞共迎丧,还葬国都。”虜群下于其主称奴,犹中国称臣也。(《宋书·鲁爽传》)

鲁爽原先生活在北方,“少有武艺,虜主拓跋焘知之,常置左右”,“幼染殊俗,无复华风”,是完全鲜卑化的汉人。他对拓跋焘自称“奴”,应是北地习俗,而沈约特地说明以“奴”作自称,相当于“臣”,是当时胡人(“虜”)的做法。

(7)显祖末,蠕蠕寇于阗,于阗患之,遣使素目伽上表曰:“西方诸国,今皆已属蠕蠕,奴世奉大国,至今无异。今蠕蠕军马到城下,奴聚兵自固,故遣使奉献,延望救援。”(《魏书·西域传·于阗国》)

于阗向北魏显祖上表请求援兵,自称“奴”,显然犹言“臣”。

(8)庆则又遣称臣,沙钵略谓其属曰:“何名为臣?”报曰:“隋国称臣,犹此称奴耳。”沙钵略曰:“得作大隋天子奴,虞仆射之力也。”(《隋书·北狄传·突厥》)

沙钵略为突厥可汗。据《隋书》所载可知,汉地对君主自称“臣”,突厥则称“奴”,“大隋天子奴”犹言大隋天子的臣子。

(9)大业三年,炀帝幸榆林,欲出塞外,陈兵耀武,经突厥中,指于涿郡。仍恐染

① 称谓词由对称(或他称)发展出自称并不鲜见,如张美兰等(2015)讨论了“兄弟”从称谓对方到称谓自己的过程和原因,姜礼立等(2019)考察了“姓+某(人)”由表他称到自称的演变。称谓词从对称或他称发展出自称用法,应该从历时角度广征例子作系统研究。

② “奴”和“臣”“仆”“妾”“婢”等具有相同的语义,完全可能具备与后者作为自称相同的语义演变路径,但“奴”作自称远晚于后者,不得不让人怀疑实际上是某种自身语义以外的因素促发的结果。

干惊惧,先遣晟往喻旨,称述帝意。染干听之,因召所部诸国,奚、霫、室韦等种落数十酋长咸萃。晟以牙中草秽,欲令染干亲自除之,示诸部落,以明威重,乃指帐前草曰:“此根大香。”染干遽嗅之曰:“殊不香也。”晟曰:“天子行幸所在,诸侯躬亲洒扫,耘除御路,以表至敬之心。今牙中芜秽,谓是留香草耳。”染干乃悟曰:“奴罪过。奴之骨肉,皆天子赐也,得效筋力,岂敢有辞?特以边人不知法耳,赖将军恩泽而教导之。将军之惠,奴之幸也。”遂拔所佩刀,亲自芟草,其贵人及诸部争放效之。(《隋书·长孙览传附长孙晟》)

染干,突厥人,即例(8)沙钵略可汗的侄子,他对长孙晟自称“奴”。

例(6)(7)(9)“奴”作自称,说话者和受话者均为胡人(或胡化汉人);例(6)(8)的解释说明性语句(划波浪线部分)更明确指出臣子自称“奴”乃胡人习俗^①。由此看来,“奴”很可能源于当时鲜卑、突厥等操阿尔泰语系语言的游牧民族^②。合理推测是:鲜卑、突厥人以本族语(或者阿尔泰语系诸语言)中专表奴隶、奴仆义的词作为臣下对君主的自称^③,汉语则以“奴”来对译^④。这种用法的“奴”最初只应用于特定场合,语域促狭。

北方游牧民族臣下对国君称己为“奴”,为“奴”泛化作自称称谓词提供了历史契机和条件,起到了促发作用。

3. “奴”作自称称谓词的地域性及扩展

刘知幾《史通·杂说中》谈到“王劭《齐志》多记当时鄙言”时,曾举过若干例子,“如今之所谓者,若中州名汉,关右称羌,易臣以奴,呼母云姊,主上有大家之号,师人致儿郎之说。凡如此例,其流甚多,必寻其本源,莫详所出,阅诸《齐志》,则了然可知。由斯而言,劭之所录,其为益弥多矣”,“师人致儿郎之说”下浦起龙《史通通释》云:“六句皆言现在俗传口语。”^⑤由此可见,“奴”见录于王劭《齐志》,乃是当时臣下对国君自称的“鄙言”“口语”。

随着民族迁徙和语言接触,“奴”的使用主体和使用语域均得以扩展。无论胡、

① 例(8)的听话人虽然不是国君,但长孙晟作为隋炀帝派出的使者,实际代表了国君,染干称“奴”也还是相当于称“臣”。

② 一般认为,于阗语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。表文上奏于北魏显祖,对译时即用符合鲜卑人语言习惯的“奴”。

③ 承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博士生戴佳文赐告,在同属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和满语中下级对上级(包括但不限于皇帝)的自称是“bogol(蒙)/aha(满)”,均为奴隶、奴才的意思。

④ “奴”是中古时期表奴隶、奴仆义最常用的词,故以之对译。之所以不选“臣”,是因为“臣”在当时奴隶义已不行用。

⑤ “现在”犹言当时。

汉,自称“奴”大概已在北朝口语中比较通行,而且也不再仅限于臣对君的场所,如例(5)自称“奴”者为汉人,是属下对上级的自称。

从促发因素和目前所见的文献用例可以推知,汉语中“奴”作自称至晚是5至6世纪初以来出现于北中国的现象,整个南北朝时期应仅行用于北方,具有比较鲜明的时代性和地域性^①。北朝汉语以“奴”作下对上的自称,正是《颜氏家训·音辞》所言“北杂夷虏”现象的词汇证据之一。

隋唐建立统一政权,“奴”又得到进一步扩散的历史机缘。

(10)(高昌王麴文泰)又以绫绢五百匹、果味两车献叶护可汗,并书称:法师者是奴弟,欲求法于婆罗门国,愿可汗怜师如怜奴,仍请敕以西诸国,给邬落马递送出境。(唐·慧立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卷1)

玄奘西行至高昌约在唐贞观三年(629)。麴文泰时为高昌王,修书于叶护可汗(西突厥可汗,沙钵略可汗之弟),二人地位相当而麴氏自称“奴”,可见它可作真正的谦称了。麴文泰作为汉人,对叶护可汗称“奴”,充分说明“奴”流行于北地,故麴文泰很自然地用以自称。当然,麴文泰作为长居西域者,必定了解胡俗,称己为“奴”也可能是遵循胡人的语言传统。

(11)(贞观二十年)铁勒回纥、拔野古、同罗、仆骨、多滥葛、思结、阿跌、契苾、跌结、浑、斛薛等十一姓各遣使朝贡,奏称:“延陀可汗不事大国,部落乌散,不知所之。奴等各有分地,不能逐延陀去,归命天子,乞置汉官。”(《旧唐书·太宗纪》)

铁勒回纥等胡人对唐太宗自称“奴”,虽然李唐皇族具有胡族血统,但仍属汉人。与上引例(6)至(10)不同的是,此时受话人已不再是胡人。

综合(10)(11)两例,可知唐代初年胡汉之间均可自称“奴”,也不局限于国君与臣属,这说明,“奴”已经摆脱称呼双方的族属及君臣身份的限制^②。

(12)代宗即位,辅国与程元振有定策功,愈恣横。私奏曰:“大家但内里坐,外事听老奴处置。”……辅国欲入中书修谢表,阍吏止之曰:“尚父罢相,不合复入此门。”

① 《百喻经》虽然是求那毗地在建康所译,但他于何处习得汉语,是否经西域由北地入南朝均不得而知,因而不能排除《百喻经》的“奴”仍然受北语影响的可能。与南朝文献相比,《百喻经》第二人称代词有着较多“尔”的用例,据真大成(2020),南朝口语已绝不用“尔”,反而北朝口语仍说“尔”。综合“奴”“尔”这些现象,可见《百喻经》的语言性质还应进一步仔细剖析。陈洪(2003)认为求那毗地所译《百喻经》乃十卷本,已失传,今传四卷本属于“失译经”。赵纪彬(2012)也认为“四卷本并不是汉译《百喻经》的原貌,可能是它的初本在民间的散佚、后为人所收集起来的部分,或他人对十卷本的改编整理,最早为《众经目录》所记,至此以后,为大多数文献所延续……今入藏的四卷本《百喻经》其实并非它的原貌,而是经过后人的加工处理,是一种本,至少成型于隋代,一直为后世所沿用,甚至被认为是该佛经的原貌”。

② 据例(5)北魏时已经突破这种限制,说明“奴”早已开始扩散。

乃气愤而言曰：“老奴死罪，事郎君不了，请于地下事先帝。”（《旧唐书·宦官传·李辅国》）

李辅国自称“老奴”，但仍与“大家”“郎君”（均指唐代宗）、“先帝”（指唐肃宗）相对而言。

（13）卢从史既缚，潞军溃，有骁卒五千，从史尝以子视者，奔于旻，旻闭城不内。众皆哭曰：“奴失帅，今公有完城，又度支钱百万在府，少赐之，为表天子求旌节。”（《新唐书·阳惠元传附阳旻》）

“骁卒”对长官自称“奴”。

（14）（妓）又遗之诗曰：“自从别后减容光，半是思郎半恨郎。欲识旧时云髻样，为奴开取缕金箱。”绝笔而逝。（宋·李昉《太平广记》卷274“欧阳詹”条，出《闽川名士传》）

“妓”自称“奴”，可见至晚8世纪后期（欧阳詹生卒年为755–800年）“奴”作自称开始用于女性，突破了说话人性别的限制。

（15）乾宁三年，李茂贞犯阙，帝次华州，韩建迎归郡中。帝郁郁不乐，每登城西齐云楼远望。明年秋，制《菩萨蛮》二首云：“……何处是英雄，迎奴归故宫^①。”（宋·计有功《唐诗纪事》卷2“昭宗”条）

如果《唐诗纪事》所载《菩萨蛮》词确为昭宗所作，则当时贵为皇帝者也可自称“奴”^②。本例没有明确的听话人，“奴”非面称，只起指称说话人的作用，相当于第一人称代词“我”。

至此，试作小结如下：

“奴”原本是胡人对其君主的自称，是北方游牧民族的语言传统。至晚从6世纪开始，汉人在下对上（卑对尊）的场合也可自称“奴”。唐代以来，无论是普通人，还是帝王朝臣，也无论男女，均可自称“奴”，应该说，至少中唐以后“奴”已经扩散至全民口语、流行全境了，原先具有的北方地域色彩大概已经消泯^③。

① 此句亦见于别书，“奴”或作“侬”，当出改易，参看蒋礼鸿（1997）“奴 孃 阿奴”条。

② 《太平广记》卷77“泓师”条（出《大唐新语》及《戎幕闲谈》）：“太上皇召肃宗谓曰：‘张均弟兄皆与逆贼作权要官，就中张均更与贼毁阿奴家事，犬彘之不若也，其罪无赦。’”吕叔湘（1985）认为此例是帝王自称“阿奴”。《资治通鉴考异》卷15引柳理《常侍言旨》“阿奴”下有“三哥”二字，甚是。实际上，此例“阿奴”乃对称，是太上皇（李隆基）称呼唐肃宗，“三哥”才是李隆基自称，“阿奴三哥”犹言你父亲（唐时父可称“哥”，李隆基行三，故称“三哥”），下文说“与阿奴处置。张均宜长流远恶处，竟终于岭表。张均宜弃市，更不要苦救这个也”，也就是李隆基替“阿奴”（唐肃宗）作出安排。

③ 刘知幾（661–721）举王劭《齐志》“易臣以奴”后说“寻其本源，莫详所出”，可见7世纪后期人已经无法辨察“奴”的来历了，进一步说明当时“奴”已是全民俗语。

从“奴”的产生、扩散路径可以看到,这其实就是南北朝时期北方的语言新质入唐以后的进一步发展变化,也是经由“北朝出口”进入唐代的一个例证^①。

4. 自称称谓词“奴”与《撰集百缘经》的译成时地

在调查文献的过程中,我们发现旧题三国吴支谦译《撰集百缘经》有两例“奴”也是用作自称:

(16)时波斯匿王及阿闍世恒共忿诤,各集四兵,象兵马兵车兵步兵,而共交战,时波斯匿王军众悉败。如是三战,军故坏败,唯王单已遁入城内,甚怀忧惨,愧耻委地,忘寝不食。时有长者,多财饶宝,不可称计,闻王愁恼,来白王言:“奴家多有金银珍宝,恣王所用,可买象马赏募健儿,还与战击,可得胜彼。今者何故,忧惨如是?”王即然可。(吴·支谦《撰集百缘经》卷1《长者七日作王缘》)

(17)于是偷人,如智臣语,向王首实:“此宝珠者,奴实盗取,畏不敢出。”王复问言:“卿前醉卧,在我殿上,诸女诘问。汝在天上,以何不首?”偷臣白言:“我昔曾入僧坊之中,闻诸比丘讲四句偈,云道诸天眼瞬极迟,世人速疾。寻自忆念,是故知非生在天上,以是不首。”于是波斯匿王还得宝珠,甚怀欢喜,不问偷臣所作罪咎。时彼偷臣,既得脱已,前白王言:“愿恕罪咎,听奴出家。”(吴·支谦《撰集百缘经》卷8《盗贼人缘》)

例(16)长者与波斯匿王之间、例(17)偷人与王之间并不存在人身隶属关系,长者与偷人也非在王所从事贱役者,也就是说,长者和偷人既非奴隶也非仆役,自称为“奴”不是表明身份,而是臣民对君主的称谓^②。

根据上文对“奴”行用时地的考述,可以反观《撰集百缘经》的译成年代和地域:它很可能译成于6世纪,而且极可能译成于北方。

《撰集百缘经》在经录中的最早记载见于隋法经等撰《众经目录》(594),因而在此之前《撰集百缘经》必定已经问世。《撰集百缘经》的两例“奴”一定意义上已摆脱臣对君的限制,与例(5)的用法最为吻合,例(7)如果是口语实录,那么说话时间在北魏孝明帝正光五年(524),即使是魏收自拟,那也在6世纪中期。这样看来,《撰集百缘经》的译成,应该就在6世纪初到6世纪末这近一百年间。而其时“奴”仅行用于北方,可见《撰集百缘经》绝不可能译于“吴”地,反而出于北方的可能性极大。

关于《撰集百缘经》的译成年代,目前学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,一致认为它必

① 关于中古汉语的“北朝出口”,参看真大成(2020)。

② 俞理明(1993:103)已经引列这两例作自称的“奴”,归入“第一人称谦称”。

定译成于三国之后,本文的推论与日本出本充代博士所认为的6世纪中叶最为吻合^①。至于它的译成区域,则是本文首次提出,不过未敢自必,只是提出一种可能,尚待学界质正云尔。

参考文献

- 陈 洪 2003 《〈百喻经〉版本校勘佚文等问题考论》,《佛学研究》总12期。
- 姜礼立 唐贤清 肖艳花 2019 《自称形式“姓+某(人)”的历时演变、使用规律及话语功能》,《语文研究》第2期。
- 蒋礼鸿 1997 《敦煌变文字义通释》(增补定本),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- 吕叔湘(著) 江蓝生(补) 1985 《近代汉语指代词》,学林出版社。
- 俞理明 1993 《佛经文献语言》,巴蜀书社。
- 张美兰 穆 涌 2015 《称谓词“兄弟”历时演变及其路径》,《中国语文》第4期。
- 赵纪彬 2012 《〈百喻经〉分卷流变考论》,《华北电力大学学报》第4期。
- 真大成 2020 《“你”字前夜的“尔”与“汝”——兼谈“你”的“北朝出口”假说》,《辞书研究》第5期。
- [日]辛岛静志 2006 《〈撰集百缘经〉的译出年代考证——出本充代博士的研究简介》,《汉语史学报》第6辑,上海教育出版社。

(责任编辑:韦良玉)

^① 出本充代博士的方法和材料与本文完全不同,具体参看辛岛静志(2006)。